

# 承泽堂方言论丛

王福堂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

李小凡 项梦冰 主编

# 承泽堂方言论丛

王福堂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

CHENGZETANG FANGYAN LUNCONG

李小凡 项梦冰 主编



● 言文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泽堂方言论丛 / 李小凡, 项梦冰主编.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80241-252-1

I. ①承… II. ①李… ②项… III. ①汉语方言一方  
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038号

---

责任编辑 章承董

装帧设计 李建章

出 版 语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sywp@163.com

排 版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语 文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787mm×1092mm

开 本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22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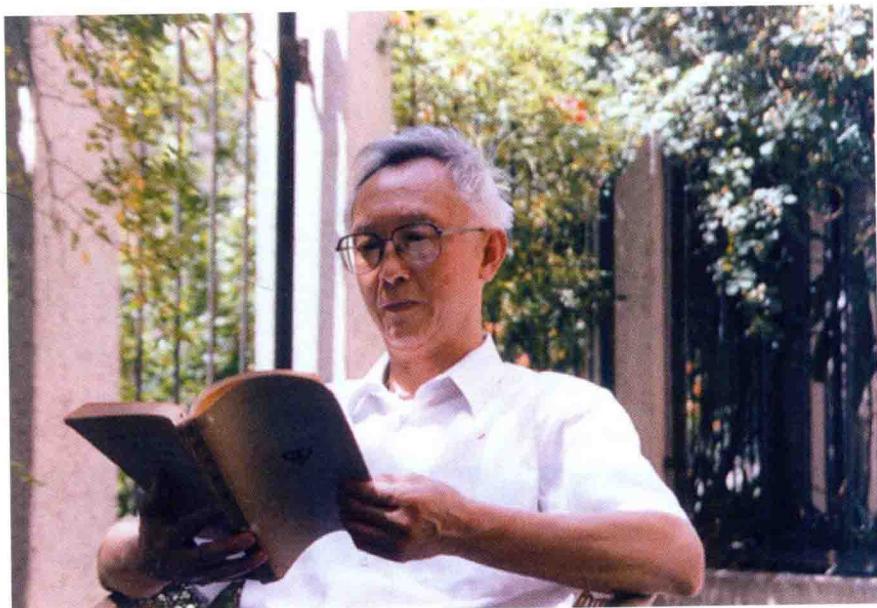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68.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王福堂先生近照



1956届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毕业照，第三排左四为王福堂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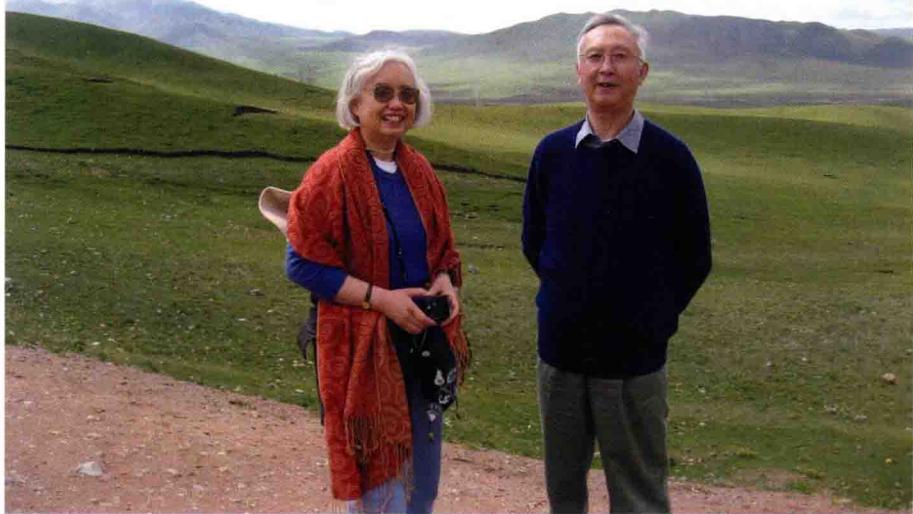
1960年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香山留影，左六为王福堂先生



方言调查



王福堂先生与学生



王福堂王洪君夫妇



难得休闲

## 前 言

这本汉语方言学论文集是为祝贺王福堂教授八秩寿诞组编的。

王福堂教授是方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他 1934 年 4 月 22 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52 年从杭州第一中学（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 年本科毕业后留系任教，先后在语言学教研室和现代汉语教研室从事汉语方言学教学和研究。投身汉语方言学事业六十年来，王福堂教授为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2002 年从教学岗位退休十余年来，他仍然保持着学术的青春，笔耕不懈，而且成果倍增，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王福堂教授对汉语方言学影响深广，这种影响既来自所记方言语料因其均衡性和精准性而为学界广泛征引，又来自所思理论方法因其前瞻性和恰当性而为学人多所吸纳。他十年磨一剑，打造出《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1989）和《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1995）。这两部涵盖汉语各大方言的语料集是方言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已经并将持久地嘉惠学林。为了打造这两部精品，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他不计个人得失，漠视以发表论英雄的潮流，将教学之外的全部精力尽数投入，十余年间不著一书一文，而当大功告成之际，两部书上却不见他的个人署名。90 年代以后，他立足汉语“自己的方言土壤”，刻意“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出版了《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1999）及其修订本（2005）。此书虽然只是“探索中的一些初步设想”，但因直面汉语方音普遍存在而用现成理论不好解释的种种现象，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解释别开生面，对近十来年的方音研究极具指导性和启发性，因而有着很高的引用率。

王福堂教授笔耕五十五载，撰著不图数量，行文惜字如金，但含金量都很高，体现出十分精致谨严的治学风格。他的处女作是关于故乡方言的《绍兴话记音》（1959），绍兴方言的论文虽占了篇数的五分之一，他却不满足于

这种“零散的”研究，而希望对绍兴方言“作有规模的调查和系统的写作”，一度又曾担心“已经很难有条件”完成夙愿，但他坚持不懈，新著《绍兴方言研究》(2014)终于在他年逾八旬时得以问世。王福堂教授方言研究的精髓在于将其“作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其视野并不囿于绍兴话和吴语，而是放眼整个汉语方言，对官、闽、客、赣、湘、粤各大方言以及平话、徽语乃至湘南、粤北土话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在同辈学者中并不多见。

王福堂教授从教五十八年，大学一毕业就给袁家骅先生当助教，辅导“汉语方言学”课，指导田野调查。60年代他开始主讲方言学课程，根据教学实际调整了逐一讲授七大方言的授课方案，写出20万字的讲稿，分为十讲：1. 绪论，2. 汉语方言发生发展的历史鸟瞰，3. 现代汉语方言的类别和分布概况，4. 绍兴方言，5. 粤方言，6. 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7. 现代汉语方言的词汇，8. 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法，9. 汉语方言的分化和集中，10. 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概况。其中4、6、7、8、10五讲为《汉语方言概要》所无。“文革”结束后，王老师倾全力打造《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和《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以致坐失将这本油印讲义修订付梓的良机，而此后的多家著作也多采取相似的架构。上世纪60和70年代王老师就曾带领学生到江苏无锡、山西大谷、湖南韶山进行过方言调查。80年代他将这种课堂讲授与田野调查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制度化，每年都带领汉语专业数十名学生成长途跋涉，进行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年逾花甲仍亲自上阵。王老师育人润物无声，而且不限于受业弟子，各路青年才俊都曾受过他的感染、点拨或提携。他在北大承泽园的寓所多有后学造访，来者常有如沐春风之感。

王福堂教授学高德重，他的学问扎实精深，他的品德高洁无瑕，他的八秩寿诞值得庆贺。这是承受过先生恩泽的后学同侪共同的心愿。但我们深知王老师拒绝虚荣，厌恶排场，故拟编写一本汉语方言学论文集以偿心愿，遂于元宵节发出倡议，即刻得到热烈响应，年底收齐文稿。29篇文章来自天南海北，异国他乡，分为通论、音韵、词汇、语法、方言分区、方言文化六组，这部急就章即告完成。出版过王福堂教授多部著作的语文出版社乐意承印本书并给以优先安排，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汇谷产学研基地东莞市智汇谷投资服务中心提供出版资助，谨此一并致谢。

李小凡 项梦冰

2013年12月31日

## 目 录

- 论《交泰韵》的音系性质及南北官话语音的区别标志 ..... 张卫东(34)  
清润话古浊声母今送气字例 ..... 刘勋宁(49)  
晋语“哥”的读音 ..... 沈 明(57)  
长治方言老中青三代人的语音差异  
——长治方言语音向普通话靠拢趋势的考察 ..... 史素芬 刘 芳(72)  
关于福州方言的音位化和表音法  
——从陶燠民《闽音研究》说起 ..... 陈泽平(86)  
漳平(溪南)方言数词结构的连读变调 ..... 陈宝贤(98)  
江浙沪交界处方言送气分调及其相关问题 ..... 陈忠敏(123)  
上海话若干韵母的混读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 薛才德(139)  
南昌地名所反映的方言读音层次 ..... 谢留文(150)  
客赣方言滋丝音的演变 ..... 江敏华(157)  
粤北土话和湘南土话古浊声母上声的演变 ..... 牟廷烈(184)

“甘謳”及其他	项梦冰(207)
汉语核心亲属称谓系统与以征为称	刘祥柏(231)
汉语方言中首位音节声母为舌尖塞音的〈什么〉和〈谁〉	中西裕树(239)
《琵琶行》“重”(chóng)、“重”(zhòng)音义辨析	伍巍(252)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九十年	李小凡(259)
陕北吴堡话的代词	邢向东(277)
山西兴县方言的体态系统	史秀菊(293)
黄孝方言进行体的表达方式	汪化云(311)
山东中西部方言的后置词“可”及其来源	岳立静(320)
巴色会传教士与德文版《简明客家语法》	庄初升(333)
图解陕南方言	李蓝(344)
吴语绍兴方言的内部分区	陶寰 金春华 盛益民(361)
南京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以日常用具为例	顾黔(390)
湘南双方言背景下姓氏濒危方言说略	
——以蓝山太平唐姓土话为例	罗昕如(409)
麻辣语文	李倩(422)
附:王福堂教授方言学论著目录	(441)

# 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研究刍议

戴昭铭

因研究之需,我想找一本方言学史看看,未料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虽有近百年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却找不到一部完整的学科史<sup>①</sup>。失望之余,我想应该写一篇文章倡议一下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本文试从必要、可能和任务三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

## 一 建立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的必要

现代汉语方言学史应当是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史,而不是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一般性综述。一般性综述只能提供相关方面研究成果的概貌,而学术史则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论析本学科学术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学术理论的演进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评断研究中的成败得失,从而给读者以学术智慧上的启迪。就一般意义而言,学术史知识是对青年学子进行学术训练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其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假如我们在教学中仅仅注重学科基本理论的讲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而不是同时注重学术史知识的传授,结果至多只能培养出一些学术工匠,而难以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问家。其中的缘由在于,一部好的学术史能揭示出该学科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真谛所在,从而

<sup>①</sup> 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台湾艺文印书馆 2001)阐述的是扬雄《方言》研究的历史,并非“现代汉语方言学史”。何耿镛《汉语言方言研究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四章“方言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407—446)、北京市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百年论丛·汉语方言学》(金有景、金欣欣撰,237—257)、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拾“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王福堂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07—536)、盛林、宫辰、李开《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第八章“方言学”(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5,319—361)等虽然做过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还算不上不完整的现代汉语方言学史。

使学习者养成对学术增长点的发现能力和自觉创新的动力。即便是学有所成的专家,也能从学术史著作所提供的广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问题分析、精到的学术评断中获得教益,得到范围相对有限的个人阅读难以得到的领悟和启发。因此,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对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是毋庸赘言的。

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以民国年间前中央研究院的相关研究为开端,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早期的草创宏图阶段,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人员相对稀少,然而几位学术大师所作的调查研究,不仅已具备相当可观的规模,而且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相对完整的学术规范。其中《现代吴语的研究》《厦门音系》《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数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经典。上世纪 50 年代为“推普”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尽管在方式上有群众运动的性质,过程和成果都有粗疏有余、科学性不足的弊病,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方言调查之需而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sup>①</sup>《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方言词汇调查手册》《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等,却体例严谨、科学而实用,标志着方言调查手段和学术规范的完善化。“文革”以后学术复兴,汉语方言研究的成绩可以用“大规模、全方位”来概括。所谓“大规模”,指方言调查覆盖范围之广泛、发表论著数量之巨大,标志性成果学术分量之厚重,都不是以往数十年可以比拟;所谓“全方位”,指方言研究突破了此前专注于单点音系描写的模式,呈现出向理论探讨、词汇和语法研究、词典编纂、方言地理研究、方言地图集编制、方言比较、方言史研究、方言与文化关系研究、方言音档和数据库建设等众多领域和方面的全面推进。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规模”和“方位”的全面进展中,方言学所获得的实质性学术进步,与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和音系学、修辞学等兄弟学科相比,不仅总体上毫不逊色,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胜出。

然而,时间跨度近百年,研究业绩和学术进步如此巨大的现代汉语方言学,至今无有一部学术史著作予以概括和总结。汉语语法学史、汉语词汇学史的专著均已有多部,而汉语方言学史独缺,这种不平衡局面不应再长久持续。即便从填补学术空白的角度而言,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的编纂也应当引起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了。

<sup>①</sup> 该表是以赵元任的《方言调查字表》为蓝本增删改定的。

## 二 建立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的可能

建立现代汉语方言学史的可能,首先在于现代汉语方言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学科属性的明晰。

科学是人类探索世界的认知活动。学科是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认知手段的增强、研究对象的显化和研究程度的深化逐渐形成的。在科学史上,许多显要的学科都是由当初的潜科学或边缘学科发展而来的。作为一个学科的汉语方言学,其形成也有一个由潜到显的过程。中国尽管上古的西汉时代已有扬雄的《方言》一书,但其“方言”概念并非现代语言学的“方言”概念,其中所收载的词语不仅有与“雅言”相对而言的俗语异称,也有殊方异族的非汉语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方言”的采集一直被当作与民间歌谣采集相似的“采风”“问俗”类工作。上世纪 20 年代初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尽管认识到了方言研究的重要,但仍只是把它作为“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来强调的。汉语方言研究脱离对歌谣采集的依附性,显示出它具有自己明确的对象、系统的方法和独特的成果,其标志性事件是 1928 年赵元任、杨时逢《现代吴语的研究》的出版。此书以及稍后直至上世纪 40 年代末出版的一系列同类论著<sup>①</sup>,已经表现出汉语方言研究成为相对独立学科的明显资质。只是此时“(汉语)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其下位的“方言学”当然无从提起。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由于过分强调推普的重要性和限制方言使用的必要,方言研究的意义被片面地说成主要为推普工作服务,其地位反倒从原先的学术研究降到了应用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方言研究逐渐摆脱了单纯为推普服务的从属地位,学科意识逐渐明朗,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普遍形成。其标志性事件是 1979 年《方言》季刊的创办和 1981 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这两件大事迅速地促成了方言研究的勃兴,许多省建立了自己的方言学会,不少大学设立了方言研究机构,各种类型的方言学术研讨会不断举办,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涌现势头之健前所未有。据有关统计,仅 1979 年至 1996 年这 18 年中所发表的论文达

<sup>①</sup> 这些论著有《两粤音说》(王力,1928 年)、《厦门音系》(罗常培 1931 年)、《钟祥方言》(赵元任,1939 年)、《临川音系》(罗常培,1941 年)、《中山方言》(赵元任,1948 年)、《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董同龢,1948 年)、《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1948 年)等数十种。

1700 多篇,出版的专著达 600 多种,大大超过了此前 70 年的总和。<sup>①</sup>

这样的背景促成了方言学家理论意识的觉醒。游汝杰于 1992 年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学导论》。该书首次较为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汉语方言学研究的对象、意义(价值)、任务和方法,并简要地勾勒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体现了汉语方言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的自觉和地位的确立。进入新世纪,伴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繁荣,应教学之需又有多部通论性的教材面世,如《汉语方言学》(李如龙 2001,2007)、《汉语方言学教程》(游汝杰 2004)、《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侯精一 2002)、《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李小凡、项梦冰 2009)等。

时至今日,汉语方言学作为汉语语言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其地位似乎已不再是个问题,然而关于其学科的属性,上列著作均未见有明确的说法。其实早在 1996 年,关于方言学的学科属性,张振兴先生已经有过明晰的阐述:

方言学是语言学中的基础学科。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对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是一种知识上和技能上的全面训练和考验。事实证明,一个优秀的方言工作者,往往可以胜任语言学其他许多部门的研究工作。因此,从学术价值和实际用途两方面说,汉语方言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科的建设中,是应该给予优先考虑的一个部门。<sup>②</sup>

张先生为什么要把方言学的学科属性确定为语言学的“基础学科”?我的体会是,语言学研究语言,然而语言只是一种概括的抽象,方言才是语言的真实存在方式;语言是一种以声音为形式手段表现意义(包括词汇语义和结构意义)的符号系统,对语言的感知和认识首先必须借助于语音,语言研究首先必须会做语言调查(首先是语音调查);方言学课程所进行的语音训练以及方言调查和音系整理方法的传授正是抓住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其所传授的知识和培养的能力正是成为一个语言学家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缺少了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就不容易成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西方语言学界正是这样培养人才的,这也正是我国许多留学欧美的前

<sup>①</sup> 见张振兴《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收载于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166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162—163 页。

辈学者成为语言学大家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①</sup>

总之,方言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学科属性的明晰,使学科史的建立具备了基本的可能。

汉语方言学史建立的可能,还在于本身理论的成熟、方法的完备有效,以及它对于汉语研究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导源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但是,以对汉语方言语音描写为开端的现代汉语方言学,并没有单纯套袭西方语言学音系描写的模式。汉语结构既有与西方语言的共性又有独特的个性,汉语语音描写更有本土形成的音韵学传统,这使民国年间那些学贯中西的语言学前辈一开始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走“中西结合”的路子:既吸收西方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现代科学性,又利用从传统音韵学形成的适合汉语特点的民族性,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音位描写和声韵调描写融成一体的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研究模式。其准确、实用、便捷、科学和可传授性等众多优点令人赞叹。这与套袭印欧语法又随西方语法学的发展而步趋以致至今尚未建立汉语语法描写的完善模式的汉语语法学形成鲜明对照,也是理论薄弱、进展迟缓、成果差强人意的汉语词汇学所难以比拟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成果却相对丰厚,与它几乎从未走过弯路有关系。

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学顺理成章地从语音描写扩展到其他领域,其卓有成效的实践均得益于理论思维的创新。在方言地理区划方面,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提出的五级划分、十大区类以及划分大区和区的两条标准(“古入声字的演变”和“古全浊声母字的演变”),尽管学界尚有异议,但成果本身无疑是对传统分区理论的突破。游汝杰(1984,1992)提出的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人文地理的关系、历史上五种移民方式与现代方言地理五种分布类型的关系,不仅见解新颖,而且有很强的解释力。李如龙(2001)从“汉语方言不可能只有语音特征而没有词汇特征”<sup>②</sup>的思路出发,提出了方言特征词理论,并带领弟子们进行了研究。特征词对于方言区划的单纯语音标准,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补充,其研究实践还

<sup>①</sup> 遗憾的是,西方语言学的这一传统在我国没有得到强调,方言学知识及相关训练在我国语言学人才培养中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以致造成许多语言研究者知识和技能的结构性残缺。尽管张先生已经表明并强调了方言学的基础学科属性,然而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sup>②</sup> 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前言》,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页。

可丰富充实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在方言语音历史演变研究方面,王洪君(1992)提供的文白异读引起的叠置式音变的现象、王福堂(1999、2006)提出的汉语方言语音演变的层次理论,以及在相关论著中揭示的方言语音变异现象,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迥异于拉波夫所描述的社会语言变异,也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语言学家用自己理论和实践充实完善普通语言学的可能。

在中国语言学界,徐通锵是公认的最有理论创新自觉和理论探索精神的语言学家。为了中国语言学不再步趋西方语言学而走上中西有效结合的理想道路,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他用 20 余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探索,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创获。他说:

这一探索过程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结构、变异和音变的制约关系,即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而变异的范围和方向则受音系结构格局的控制,并根据这种制约关系的研究提出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理论和方法。<sup>①</sup>

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普通语言学价值的理论发现,而这一发现正是他坚持长期“自己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sup>②</sup>的结果。徐先生利用自己的发现修正了西方语言学的“内部拟测法”的不合理处<sup>③</sup>。他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推出的《历史语言学》把丰富的汉语方言语料、自己的理论发现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熔铸成一体,在语音历史演变的理论方面首次实现了中国语言学界“中西结合”的梦想。徐先生的成绩表明了汉语方言研究可以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是汉语方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新时期里中国语言学的不少实质性进展,都与汉语方言研究有关。比如,上世纪 80—90 年代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始自游汝杰(与周振鹤合作)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他对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倡导。《方言与中国文化》奠定了文化语言学“关系论派”的研究模式,催生了汉语学界、民族语言学界、外语学界和对外汉语学界“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语言教学的观念、内容和方法,其中许多研究者成为当时刚刚兴起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生力军,其成果成为以定性分析、文化解释为主

<sup>①</sup> 徐通锵《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序言》,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2 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参见徐通锵《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商务印书馆 1989 年;《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语文研究》1994 年第 3—4 期。